

王 观 泉 著

天火

"Tian huo"
zai zhong guo
ran shao

“天火”在中国燃烧

天津人民出版社

天火

天火在中国燃烧

天火在中国燃烧

天火在中国燃烧

DD A1 98 D231 I20 72

“天火”在中国燃烧

王 观 泉 著

000012529

天 津 人 民 出 版 社



SZ0012375

“天火”在中国燃烧

王观泉 著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4.5印张 2插页 93千字

1984年9月第1版 1984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910

统一书号: 3072·610

定 价: 0.62元

前言

题《“天火”在中国燃烧》，是取鲁迅先生之意：“人往往以神话中的Prometheus比革命者，以为窃火给人，虽遭天帝之虐待不悔，其博大坚忍正相同”。鲁迅的话，又使我想起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的那句名言：“普罗米修斯是哲学日历中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自己并解放全人类的斗争的科学，为了传播这一真理，一个半世纪来出现了多少象普罗米修斯那样的圣者和殉道者啊！一九一七年，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俄罗斯土地上获得伟大的实践；十月革命的胜利震撼世界。两年后，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并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一场天翻地覆的斗争就这样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发生了，多少普罗米修斯发大心愿，吃大苦楚，忍大艰难，历尽险阻上天入地将“天火”——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萌生，并给斗争以积极的影响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直接受益于马克思主义，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起，到本书叙

迷的最后年代一九三〇年“左联”成立，十年光景，“天火”越燃越旺。

诚然，以马克思主义成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人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普遍提高的今天来与过去相比，自然是不可同日而语。但是，没有星星之火，那来的燎原之势。鲁迅说：“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阳，我们自然心悦诚服的消失，不但毫无不平，而且还要随喜赞美这炬火或太阳；因为他照了人类，连我都在内”^①。这是多么博大坚忍的襟怀！这就是先驱者的献身精神：普罗米修斯精神。沐浴在温煦阳光下的我们，真不应该忘却“在黑暗里发一点光”引起“天火”燃烧的普罗米修斯的事业。本书没有什么奢望，就是顺着先驱者光明的追求的足迹，作一个历史的回顾，不过是数数足迹，量量步子的粗浅的探索。自然，对于早被遗忘了的足印，我们为引起重视就多讲几句；对于明显的弯道，我们也绕着走一阵，以得出足够的教训。

全书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引子，说的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欧洲那些反对封建贵族，赞扬资产阶级民主的文学——当时主要是俄国、法国和英国

^①《热风·随感录四十一》。

文学，冲击着中国封建传统文学；这是辛亥革命即旧民主主义革命赋予文学的使命。第二部分是“五四”运动至一九二五年，主要叙述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马克思主义在我国从理论宣传走向革命实践过程中，文学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概况。第三部分叙述的是“五卅”运动起经过“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国共产党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始夺取政权的武装斗争，直到“左联”成立期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传播和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

在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指导下革命文学的萌芽、发展、壮大，是多么壮丽的历史篇章！但至今却还没有进行过史的研究和探索。这样说，主要并不是希冀读者原谅本书的简陋或难免产生的错误；说明这一点，虽然有这么个意思在，但是主要还是深感自己面对这么光辉的十年的大量资料，缺乏史识，直无搏击之力；总算捏成一团，形成一册书，就权作引玉之砖，作为期待鸿篇巨著出来之前的填空吧。一九八三年，是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本书能在这可纪念的一年里写成，是值得庆幸的。欣喜之余，倒也用得着上引鲁迅的话的精神，笔者心悦诚服地愿意消失在炬火之中。

一九八二年，亚寒带罕遇的酷热之夏，写于哈尔滨南岗区耀景街十六号六米见方书堆上。

本书引用书目索引

本书的读者对象为大专院校中文系一般教师和学生，以及在这一学识水平上的有阅读本书必要或感兴趣的各行各业中的朋友（笔者极愿从事政治思想工作的同志工余一读，以了解我国文艺工作者是如何艰难地上下求索马克思主义的）。为此，尽量把一切要叙述的问题都放在正文中说清，不使繁琐的注释打断阅读的兴趣。同时，对于资料的运用则尽量采取最易见的版本，也即是说大量运用的是有关资料的汇编本。这是考虑到本书叙述年代的有关资料现在已经入“善本”书库珍藏，读者很难读到（其实也并无多大必要去查找善本）的缘故。这样作并不等于不择版本，不，笔者在撰写时对于重要文章尽可能找到初版原书核实，以示科学性。一般来说，这种情况不多。※

为争取减少书刊篇目注释，本书采取笔者自己设想的一种检索方法，即将本书常用的或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全部书目列出并用拉丁字母编号，注入正文所引用的题目旁或引文旁。方法如下：

“……（引文）” A-1:123

其中“A”代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卷本），“-1”代表卷次。“:123”代表页码。

“…… (引文) ” A-1, B-1

其中“A-1”代表引文出处,“B-1”代表此引文在这册书中也有,以便通用。

“…… (引文) ” C-1/3。

其中“C”为期刊名,“/”前为卷数;后为期数。

“……” (D-1)

带括号的编码,表明虽无具体引文,但笔者在写作时曾参考此书,以备读者单独深入研究此项问题时检索。

这里需要附带说明的是关于西方国家人名。如普列汉诺夫,在历史上就有蒲力汗诺夫、朴列汗诺夫、普列哈诺夫等不同的译名。本书一律从属引文,在叙述中直接提到人名时也随引文而定,以免由不必要的更易而产生误会。在不涉及引文的笔者自己的文字中才从今译。

本书常用书目索引如下:

A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4),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

B 《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1—4)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6月版。

C 《列宁选集》(1—4),人民出版社1972年10月第2版。

D 《列宁论艺术》(1、2),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4月版。

E 《毛泽东选集》(1—5竖排本),人民出版社1951年起陆续出版。

F 《鲁迅全集》(1—16),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G 《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5月版,1978年5

月第三次印刷。

H 《瞿秋白文集》(1—4),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12月版。

I 《瞿秋白著译系年目录》, 丁景唐, 文操合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1月版。

J 郭沫若《学生时代》(《沫若自传》之二),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3月版。

K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10月版。

L 恽代英《来鸿去燕录》, 北京出版社1981年5月版。

M 《中国新文学大系》(1《建设理论集》, 2《文学论争集》), 赵家璧主编, 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 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复印本。

N 《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 李何林编, 生活书店1939年3月版。

Q 《文学运动史料选》(1—2), 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15月版。

P 《“革命文学”讨论集》(1:上, 2:下),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1月版。

Q 《新青年》(1—9卷)

R 《五四时期的社团》(1—4), 三联书店1979年4月版。

S 《五四时期期刊介绍》(1—3), 三联书店1978年11月版。

T 《中国现代出版史料》(1:甲编, 2:乙编), 张静庐编, 中华书局1954年12月版。

U 《鲁迅研究资料》(1—8) 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 文物出版社版(1—3), 天津人民出版社版(4—8)。

V 《纪念与研究》(1—4), 上海鲁迅纪念馆1978年创刊。

W 《新文学史料》(总第1期起),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创刊。

X 《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1—6), 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创刊。

上列书目中, 笔者虽没有具体引录, 但对撰文有重要参考价值者也列入了, 细心的读者可以觉察到。

※ 笔者的工作地点在哈尔滨, 此地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奇缺, 收集此书资料主要依靠出差机会在各地借阅手抄。近年来, 于六十年代开始的影印旧书刊的工作又重新大力发展, 得益不少。例如在研究“文艺自由论”、“第三种文学”时, 要借阅六十年代影印的《现代》月刊是很难的, 最近收到上海书店影印的苏汶编现代书局1933年出版的《文艺自由论辩集》, 使这一题目的大部分引文得以据此版本校正。又本书引用《新青年》(1916年起的月刊和1923年起的季刊)等期刊全部据影印本。一则在此加以说明, 以昭信实, 再则也可表明影印旧籍的工作对于保存史料和促进学术研究的重要作用。

E 《毛泽东选集》(1—5竖排本), 人民出版社1951年出版。

《鲁迅全集》(1—16),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5月版, 1973年5月版。

《李大钊全集》(1—16), 人民出版社1958年5月版, 1973年5月版。

米芾——封禁制衡学文街夫出籍——肝幸《辛青德》
——“低正”既“十二”从——封禁制衡学文街慈
已丑普——封禁未——义意制衡制衡中固军商丑普
湖出制衡已丑普制衡宁既——《制衡学文街制衡表》
制衡学文街制衡——会制衡学文——新中大一策《制
制衡目》苦未既——封文日制衡否封制衡——封号《封

目 录

前 言.....(1)

本书引用书目索引.....(1)

第一部分.....(1)

辛亥革命——新学冲击旧学——白话代替文言
——文学改良“八事”——三个推倒和三个建设
——鲁迅与陈独秀的异同——先驱者的努力——鲁
迅的美学思想——林纾译“泰西小说”否定自己
——分裂与净化——打开了世界之窗——中国人知
道德国马克思。

第二部分.....(15)

阿美乐尔号炮声——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
观》——《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新青年》的业
绩——从理论宣传到组织建设——在实践中运用马
克思主义——两次刊布《共产党宣言》中的革命十大
纲领——李大钊与《晨报》副刊——“过激主义”来
了——两支队伍——提出新兴文学的社会条件——
到苏维埃俄罗斯去——培养干部——恽代英与《中
国青年》——沈泽民与肖楚女的见解——瞿秋白与

《新青年》季刊——郁达夫论文学的阶级性——蒋光慈论文学的阶级性——从“二七”到“五卅”——鲁迅向军阀冲锋陷阵的意义——未名社——鲁迅与《苏俄的文艺论战》——列宁《党的组织与党的出版物》第一次中译——文学研究会——《俄国文学研究》号外——创造社否定昨日之我——郭沫若“目的意识性”获得“剧变”——茅盾在一九二一年——再谈《中国青年》

第三部分 (76)

茅盾《论无产阶级艺术》——大量译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托洛斯基的《文学与革命》——“同路人”理论与“第三种人”——哈克纳斯也是“同路人”——批判托洛斯基文艺理论中的错误——普列汉诺夫的文艺理论——鲁迅译普氏《艺术论》时的分析——求助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创造社的贡献——《文学和出汗》——重提文学的阶级性——鲁迅“硬译”了多少——一九三一年时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运动——苏联文学作品的意义——提出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创作题材——瞿秋白的贡献——冯雪峰翻译得最多——恩格斯的现实主义定义——日本普罗文学运动与中国——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

后记 (133)

第一部分

辛亥革命——新学冲击旧学——白话

代替文言——文学改良“八事”——三个推

倒和三个建设——鲁迅与陈独秀的异同——

先驱者的努力——鲁迅的美学思想——

林纾译“泰西小说”否定自己——分裂与净

化——打开了世界之窗——中国人知道了

德国马克思

从一八四〇年到一九一一年，中国人民经过七十年的努力，终于发生了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即辛亥革命。这是一场不彻底的革命，但总算把皇帝拉下马，结束了封建王朝统治，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转折。说不彻底，指的也由于辛亥革命仅只是把皇帝拉下马，其所产生的封建割据的军阀政治，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经济基础没有圯塌。至于献身这场革命的先烈，从孙中山到秋瑾，从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到成千上万无名战士，他们推翻封建王朝的意志却是十分坚决的，可歌可泣的，刚烈悲壮的。这场革命反映在文化上，其成就也是不小的，简括地说，就是与中国封建主义文化(旧学)对立的“新学”，就是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

中指出的“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是“侵略学生”的国家里发生的，(E-4:1475)当然不能救中国，更谈不上以此产生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文化，但是终于把顽固地持续了长达二千多年之久的封建文化冲垮的功劳却不可泯没。首先是用白话文取代了控制中国人民表达思想的文言文，这是中国现代文化思想、文学艺术的革新和革命能获得胜利的起跑线。

过去，我们对于这一历史变化——即新学与旧学斗争中白话终于替代了文言，使书面语和口头语逐步趋向统一——认识是不足的。其实这是一个带有根本性质的改革，是新学向旧学战而取胜的重要一役。考察欧洲资产阶级的革命过程，在意识形态的改造方面，书面语言（文字）和口头语言由分离趋向统一，（这对于拉丁化拼音文字国家和民族是容易的）使表达思想的语言工具能为越来越多的人利用，这也是争取人权和言论自由的重要方面。瞿秋白在三十年代掀起的文艺大众化的讨论中曾多次涉及过这个问题，如他在《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H-2:853）一文中指出：

中国的“言”和“文”之间的区别为什么如此之大？就因为封建余孽作祟。“五四”以前士大夫用的文言，据说是“周朝话”，其实只是周朝话的极模糊极省略的记录，因为用以记录的工具是象形文字，所以就不能够不模糊省略。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要想推行所谓“白话文”，这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之中的一般文化革命的任务，自然不是狭义的文学革命。（H-2:857）

瞿秋白的文字改革理论是相当激进的，他在关系到中国人民如何表达思想的语言工具的改革的研究上是有片面性的，这主要表现在取消方块字走拉丁化拼音文字道路上的冒进观点。然而他痛恨文言文的束缚思想，将提倡白话文纳入资产阶级民权革命范畴，力图使书面语与口语统一，说文言和白话区别之大是“封建余孽作祟”的结论，则是正确的。鲁迅在“文白之争”问题上的认识更是深刻，不必列举他在这方面的理论阐述，只要读一读他在回忆录《二十四孝图》中以十分恼怒的口气说的一段话就可见一斑：“我总要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即使人死了真有灵魂，因这最恶的心，应该堕入地狱，也将决不悔改，总要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F-2:521）“妨害白话者的流毒却甚于洪水猛兽，非常广大，也非常长久，能使全中国化成一个麻胡，凡有孩子都死在他肚子里。只要对于白话来加以谋害者，都应该灭亡！”

（F-2:251）看来，“救救孩子”——祖国的未来，首先要提倡白话文。（后来，鲁迅又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F-4:282）中提出了“繁难的象形字”剥夺了劳动人民自修知识的权利的问题，则是从社会革命的角度、扫除文盲建设精神文明的角度提出来的。）鲁迅的这些话，是对于捆绑了中国数千年精神文化的语言和文字严重分离的义愤，正是人民大众渴望求知的心声。“文白之争”在当时是保守和革新的拼出人命来的斗争，最终是在五四运动西方的语言语法学理论传入中国之后才获得较好的解决，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说，文化新军二十年来建立的丰功

伟业中“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E-2:691）。（着重点为引者所加）封建余孽猖狂阻碍白话文的传播，正是“文白之争”从辛亥革命一直拖到五四运动才解决的社会原因。

文白之争的必然趋势是提出文学革命的问题，“五四”前夕，胡适先在《致陈独秀》（M-1:31）继在《文学改良刍议》（M-1:34）中提出文学改良“八事”：“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M-1:34）现在看来，这“八事”或“八不主义”真是稀松平常，但在当时却是引起大波的宣言。“八事”不涉及文学革命的内容，却为文学革命创造了语言表达的条件，应当看作是文学作者到生活中去采风，与人沟通思想和表达思想的语言条件开始成熟。这是一九一七年的事，接着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M-1:44）提出了著名的三个“推倒”和三个“建设”：

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瞭的通俗的社会文学。（M-1:44）

显然，这是资产阶级文学在与封建文学进行理论的较量中得出的结论。胡适的“八事”，诚如上引瞿秋白所说的是“资产